

镜子里的影子：瞿秋白和他的世界

黄道炫

【摘要】作为中共早期革命领袖，瞿秋白身上背负着多种思想的包袱。中国传统儒学精神是他的思想底色，佛家、道家思想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，与此同时，外来西方文化不断形成冲击。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，瞿秋白深感自身未能完全脱出旧思想的窠臼，身上挥之不去的绅士气，尤其让他惶惑不安。瞿秋白的处境，其实是五四一代知识人在新旧转换中面对的共同问题，所谓肩着黑暗的闸门，放别人一条生路，是他们的生动写照。这样的背景，加之现实政治与生活的机缘巧合，使得瞿秋白在爱的选择、寻找光明的冲动、锚定现实的艰难中，都宁愿以弃绝自我面对，这样的弃绝，最终酿就了瞿秋白的命运。

【关键词】瞿秋白；新文化；多余的话；佛教

【作者简介】黄道炫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（北京 100871）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清华大学学报》：哲学社会科学版（京），2022.4.99～112

年轻时的瞿秋白曾经发问：“在镜子里看影子，虽然不是真实的……可是真实的在那里？”^①这是一个有着典型瞿秋白风格的问题。作为一个革命者，瞿秋白多少有些特殊，很多时候，他都处于各种力量的纠葛之中。1924年1月11日，瞿秋白致信爱人王剑虹说：“我心里确实是矛盾，我从小便觉得我的心灵有两个世界，我有两重人格……梦可阿，你的音容时时化作种种印象安慰着我，——虽然我仍旧不动声色的和旁人谈话做事，（旁人丝毫不能觉察我的心事），然而，我总是自己欣慰着：我现在另有我的‘自己’。”^②瞿秋白写这些，旨在表白内心中的思念。不过，其中传达的两个世界、两重人格，却也吐露了瞿秋白性格中的一些特征。

事实上，更早的文本中，瞿秋白已经谈到自己“二元的人生观”，1920年的《饿乡纪程》中，瞿秋白写道：

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。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，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；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，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。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，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“二元的人生观”。一部分的生

活经营我“世间的”责任，为自立生计的预备；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“出世间”的功德，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。我的进俄文专修馆，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，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。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。^③

在这里，“二元的人生观”指的是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，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可以相互隔绝，各自独立运行。无论两重世界还是二元人生观，都意指可以构建外在和内心两个相互隔离的世界，前者展示于人，后者则属于瞿秋白自身。

写《多余的话》时，瞿秋白再一次谈到自己的二元人格，也正是这一次的谈起，让二元人格的说法成为观察他的性格的铁证。《多余的话》中谈到的二元人格仍然具有双重意义：一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同在：“我二十一二岁，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，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。人生观或是主义，这是一种思想方法——所谓思路；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，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。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？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、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、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

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,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。”二是日常生活中的显性和隐性的自己同在:“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,都觉得很麻烦,总在急急于结束,好‘回到自己那里去’休息。我每每幻想着: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,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,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。”瞿秋白自承:“这种二分化的人格,我自己早已发觉——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,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;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,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,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,一至延迟下来,隐忍着。甚至对之华(我的爱人)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,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。没有这样的勇气。”^④

二元性格的瞿秋白,向世界追逐,又与世界疏离。这些当然无碍于其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认知,却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瞿秋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。其实,多数时候多数人,大概都有无法判然分明的复杂世界。这里面,有现实生存的世界,有企求中的理想世界,有自己甚至都不完全明了的潜意识世界,还有和众人一起不断构造着的世界。

一、爱的自我埋葬

1980年,丁玲刚刚复出,写下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,追怀1935年在福建长汀就义的老师及友人瞿秋白。由于和瞿秋白第一任夫人王剑虹的特殊关系,丁玲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她和王剑虹的友情,瞿、王结合的经过。王剑虹和丁玲都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大学的学生,瞿秋白常常来宿舍教她们俄语,逐渐地,丁玲感觉到瞿秋白和王剑虹都有些变化,不明所以的她偶然发现了王剑虹的秘密,王的垫被底下放满了写给瞿秋白的情书,丁玲知道好友爱上了瞿秋白,她决定去找瞿秋白:

我无声地、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。他退到一边去读诗,读了许久,才又走过来,用颤抖的声音问道:“这是剑虹写的?”我答道:“自然是剑虹。你要知道,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。你走吧,到我们宿舍去,她在那里。我将留在你这里,过两个钟头再回去。秋白!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不忍心她回老家,她是没有母亲的,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?”秋白曾经详细地同我们讲过他的家庭,特

别是他母亲吞火柴头自尽的事,我们听时都很难过。“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,我愿意你们幸福。”

他握了一下我的手,说道:“我谢谢你。”^⑤

长期来,丁玲关于这一过程的叙述成为瞿、王结合的经典叙述。然而,2017年,丁玲之子蒋祖林撰写的《丁玲传》,将这一叙述推上了被质疑的位置。蒋祖林记叙,1977年,他去探望还在等待复出的丁玲,丁玲跟他谈到瞿秋白,说了这样的判断:“其实,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,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,他就不会接受剑虹。”蒋祖林记叙的丁玲回忆是,她拿了王剑虹表达对瞿秋白爱慕的诗稿去找瞿秋白:

瞿秋白问:“这是谁写的?”我说:“这还看得出来吗?自然是剑虹。”他无言走去,并且躺在床上,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他问我:“你说,我该怎么办?”我说:“我年纪还小,还无意爱情与婚姻的事。剑虹很好。你要知道,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。你该走,到我们宿舍去……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”。我更向他表示:“我愿意将你让给她,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!”他沉默了许久,最后站起来,握了一下我的手,说道:“我听你的。”^⑥

“谢谢你”和“听你的”,两个不一样的表达,一下子把丁玲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。丁玲卷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情感纠葛,在丁玲母亲的回忆录中也可约略见出,丁母记录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,丁玲从上海返乡的情景:“不日女回,吾心甚慰,惟伊悒悒不乐,非复往日之态度。吾不胜忧虑,对伊百般体贴,任其所欲,曲尽慈母之职,殷勤如抚幼孩,常把伊拥抱怀中,或其他郊外闲逛……忽海上来电云:乃女之契友某某病故。女悲痛之至,即刻要走。我见伊对友如是之情深,亦为之痛。”^⑦

丁母的回忆显示当时的丁玲确实可能陷进感情风波当中,但是否如蒋祖林转述,当年瞿秋白实际爱上的是丁玲,丁玲和瞿秋白共同选择了放弃自己真正的最爱,成全了王剑虹,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。1924年结婚前后,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情书或许能解开一些谜底。

1924年1月,正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瞿秋白给王剑虹写去许多情书,其中多次提到丁玲,即文中的冰之:

冰之是安琪儿,她握着我你的生命。她……我怎样才好呢?我怎样才好呢?……

你要死,千万也当[等]着我死,——假使你还爱我,假使你那时还爱我。

冰之这样的知己,宇宙间独一无二的。难道不能原谅人……^⑧

我想,你还可怜我,冰之也还可怜我,给我以一线希望!——我回来之后不能再离别了。置我于死地么?我也体贴得到,冰之心里是个什么味儿。可是你并不曾不爱她,是不是?难道不能分一些儿?你现在做些什么?好好的,不要尽着闲愁闲。^⑨

看得出来,三个人中间发生了些什么,但到底是什么,仅从信中难以索解。此时,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信中,也不无灰暗的痕迹:“关于我俩的一切,我现在也没半个字可以说的,我们的别意离情,只是最细微的一点爱曲中的哀调罢了!过了这些日子自然再有美妙的欢音出现。”^⑩“昨宵,可怕的风雨之夜……我曾经做得有几首诗……可是烧了!……好!我没法同你说了。恕我!”^⑪这样的表达,不像热恋中的情人的言语。虽然,有论者会将之理解为王剑虹对自己身体的担忧,但下面一段话无法完全用身体状况解释:

我的魂儿么?我已是做了她的□人。我新发现我对伊一切不能干涉:——一切的都在她面前失力,我在她身上已经无权力了!!……她决意春间要回湖南去,我……不说了吧。

……

我自死不满意我自己,虽然一时期曾□过人类的“爱”的期间。

我十分疑惑我自己,直到我临近“地狱的门”的那一天。

我这些话你一定不明白。你一定不以为然或以为我随便说说——我是费了无限思索——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实在话呵!我是一个“鬼”,一个□□的鬼,我暂时为你的挚“爱”不诅咒我自己。等到……我便……^⑫

这里的爱都打了引号,尤其是写到瞿秋白的挚爱也打了引号,这出现在情人间的书信中,毕竟不同寻常。

王剑虹说到的丁玲要回老家的事,瞿秋白信中也有提及:

你的魂儿竟如此决意的要回去吗。我心说不出的难受。你能安心的听她回去吗?也许你心上难受,故意不写出来。我明白你的心事。你疑惑你自己。我呢,摆布不得我自己。冰之是天上的神仙,千万要劝她把握定自己的倾向,勉力做得世间人;她和你都能大有益于世间呢。^⑬

你切勿为我牺牲你的魂儿,你爱她得厉害……。冰之呵,你何苦这样猜疑,我万不敢……。你说,假使冰之的走,是我的罪魁,我是什么味儿。我万不如冰之的真挚。^⑭

这期间,还有一个插曲,瞿秋白的弟弟瞿白爱爱上了丁玲,但丁玲无法接受白白的爱。王剑虹告诉了瞿秋白这一消息,对此,瞿秋白的反应是:

冰之和白白的事我早就料到的——白白是个傻子,哪里禁得起。然而我看冰之也的确不爱他,冰之的确也不能给他所求的,那有什么法想!何以断定她不爱他呢?我也不知道。白白呢?他也不是真爱——真爱的又何必这样勉强。他不知道,既然表示之后已经得了一个否定的答复——假使他真正爱她,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——他就应当体谅她那‘被爱而不爱’的苦,不再纠缠着。既是爱得她如此真挚,应当愿意她有幸福,而他的苦笑眼泪无一不是置她于无可奈何之地,那又是什么爱呢?^⑮

仔细读瞿秋白这段话,结合蒋祖林说到的瞿秋白和丁玲的“让”,或许别有一番滋味。如果蒋祖林所说的“让”真的成立,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说到的如何面对不爱你的人时,就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:“既然表示之后已经得了一个否定的答复,——假使他真正爱她,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,——他就应当体谅她那‘被爱而不爱’的苦,不再纠缠着。”这是瞿秋白心目中理想的爱。无论是爱的追求,还是社会改造的追求,瞿秋白心中都悬着一个理想:“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,没有极端的感情,不受无意识暗示,而有积极的怀疑心,有沉静的研究心,有强固坚决的毅力。”^⑯为了自己的爱人,可以埋葬自己的爱。

不过,当瞿秋白这样做的时候,未必了解丁玲的

真正心理,丁玲的让并不一定是不爱,而可能是少女面对骤然到来的爱的迷茫,她怕过早陷入爱情,也怕影响和挚友王剑虹的关系。瞿秋白的让,或许并不是丁玲内心真正希望有的结果,他们只是共同用自己的退让营造了一个高尚的牺牲。问题在于,对瞿秋白和丁玲的“让”,后来王剑虹也知道了,如丁玲所说:“我想,她或许不知道。但婚后,我想,她定会知道的。”^①丁玲的判断和王剑虹信里流露的情绪结合起来看,应该属实。那这样的“让”,对王剑虹来说,毋宁又是一种难以面对的残忍。爱应该是纯净的,瞿秋白和丁玲认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牺牲诠释这种纯净,然而有时候埋葬自我可能并不是维护纯净好的方式。临终前,瞿秋白回忆自己一生:

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,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,站不稳的。总希望有一个依靠。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,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:“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[一样],总那么客气,说起话来,不是‘或是’,就是‘也许’、‘也难说’……等”。其实,这倒是真心话。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“客气”或者“狡猾”。^②

两百多年老旧的大家族,养成了瞿秋白的绅士气,也斫伤了瞿秋白生命的本能。新文化运动中,重新认知性、婚姻、家庭、社会的后面,其实是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释放。瞿秋白对这些当然不是没有感知,他也在尽力和时代靠拢,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和这种不断粗粝自己情感的要求实在相距过远。他被捕后写信给郭沫若说:“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,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经不起了。”^③确实是切肤之叹。瞿秋白“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,‘和和气气的过日子’”,^④然而五四之后的中国,争论和抉择成为潮流,何况他后来还卷入政治的第一线,又成为强调斗争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员。他的精神世界和这个时代的睽违,一开始就已注定,尽管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他努力为之鼓与呼的。^⑤这也就是他说的:

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。扮着大学教授,扮着政治家,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“剧中人”。虽然,这对于我很苦,得每天盼望着散会,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,让

我卸下戏装,还我本来面目——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“回‘家’去罢,回‘家’去罢”,这的确是很苦的。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,大致总还扮得不差,像煞有介事的。^⑥

作为中共早期的政治领袖,瞿秋白当然不是政治的门外汉,他的政治天分,当和政治运动——五四运动——初次相遇时就有体现。一起参与五四运动的郑振铎记述,运动开始后,两人分别成为学校的代表,“俄专”“汇文”和“铁路管理”几个学校代表平常见面多,比较熟悉,“开会、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。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‘谋主’,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,起了很大的作用,使我们的活动,正确而富有灵活性,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”。^⑦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,能够成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领袖,哪怕是一个小群体的领袖,通常都要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驾驭人心的能力,非自命清高或甘于退隐者所可为,瞿秋白能够成为几个学校学生领袖中的领袖,郑振铎的回忆应属可信。

然而,瞿秋白自己对五四中的角色却另有一番解读。按照他自己的讲述,五四时期他参与运动,就是“历史的误会”的起点:“五四运动一开始,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。当时的一些同学里,谁也不愿意干,结果,我得做这一学校的‘政治领袖’,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。”^⑧不止于此,无论早期还是后期,他的自述中很难看到他努力奋斗的那一面。钱穆幼时与瞿秋白同校,他笔下的学生时代的瞿秋白是这样的:“时全校皆寄宿生,家在城中者,周末得离校。一日,舍监室又出示,周末须告假,乃得离校。时低余两级有一同学名瞿双,因其发顶有两结故名。后易名霜,遂字秋白。其人矮小文弱,而以聪慧得群誉。周末晚餐后,瞿双独自一人直入舍监室,室内壁上有一木板,悬家在城中诸生之名牌。瞿双一人肩之出室,大声言,‘今晚全体告假’。户外数十人呼哗为助。士辛师(陈士辛,舍监)一人在室,竟无可奈何。遂大群出至门房,放下此木板,扬长离校。”^⑨这里的瞿秋白自幼敢于反抗压迫,正是后来在中共革命者的自述、回忆及传记中反复出现的形象,大多数革命者也乐于以这样的形象示人,但在瞿秋白本人的叙述中,无论早期还是后期,这样的

事件都完全隐去,这样的隐没当非偶然。

有意忽略自身性格中强悍的一面,和在爱的冲突中选择抽身一样,都和瞿秋白内心中浓厚的绅士气相关。如他自己所说,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自己的绅士气,其实,与其说没有走出,不如说他自己有意无意选择停留,他厌恶绅士气,却又嗜痂成癖,这就是瞿秋白的纠结。爱的退让中,既有他的善意,未始也没有他自己说到的演的成分,悲剧于他而言,是痛苦,也未尝不是享受。瞿秋白的演,与其说是演,不如说是携着旧戏装上到新舞台后命定的人生进程。

二、光明和死亡

1920年3月,瞿秋白在《心的声音》中写道:

心呢?……真如香象渡河,毫无迹象可寻;他空空洞洞,也不是春鸟,也不是夏雷,也不是冬风,更何处来的声音?……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,我不知道,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,让我来听者自听,我已经是不能做到,这静悄悄地听着,我安安静静地等着;响!心里响呢,心外响呢?心里响的——不是!心里没有响。心外响的——不是!要是心外响的,又怎样能听见他呢?我心上想着,我的心响着。^⑤

如“香象渡河”这个典故浓厚的佛教色彩显示的,《心的声音》尽管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的影子,^⑥究其实,还是禅宗六祖慧能“幡动还是心动”的翻版。众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瞿秋白和佛学的关系,瞿秋白自称:“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,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。”事实上,当瞿秋白说去苏俄是辟一条光明的路时,这里所说的“光明”,更可能和瞿秋白如下的表白有关:“菩萨行的人生观,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。”^⑦所谓菩萨行,就是要有慈、悲、喜、舍的无量心,度己度人,进于般若也就是光明之境。

清末民初,佛教文化一度有重振之势,唯识宗复兴,人间佛学展开。唯识宗复兴的代表人物欧阳竟无特别拈出“悲”字予以阐发:“今人不明大悲为学佛要事,实属误解佛法之尤,不可不抉择发挥。且概括数言示其要略,曰:诸佛菩萨由观苦而起悲(诸佛以苦谛为师,明了观苦乃无系缚;见他即自,又自然牵动而生大悲,此非逃苦、厌苦、怖苦、舍苦所可比也),

由大悲而利他,由利他而起苦(一切苦悉入生死苦中,不舍生死即是不舍一切苦,此盖触真实苦以苦为大乐乃能如是),由起苦而不住涅槃。”^⑧近代中国的凄风苦雨,让悲苦成为社会的底色,欧阳竟无的由观苦而起悲,由大悲而利他,由利他而起苦,由起苦而不住涅槃的修行观,暗合着佛教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回应。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抉择,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悲和大愿心。^⑨正因此,欧阳竟无重振唯识学的举措,激起社会的回响,唯识学成为民初佛教的潮流,^⑩瞿秋白接触佛学也是从阅读《成唯识论》开始的。

以悲苦之心直面社会,从悲苦中求振拔,是民初佛教提供给国人的思想资源,五四时代普遍的悲苦、烦闷叙述乃至将之推向极端的做法不能说都源自佛教,却和民初佛教的思路同源。瞿秋白的性格、经历和阅读让他和这样的悲苦叙述有特别的共鸣。^⑪无论是早年带有自述色彩的《饿乡纪程》《赤都心史》,还是临终前的《多余的话》,都能看到一以贯之的悲苦叙述,却很难看到一个探索者和革命者果决、勇敢、奋斗的一面,瞿秋白笔下的自己,总是充满着忧伤、犹豫、退却、隐忍。他定位自己为“文人”,就是“无所用之的人物。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、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,这是吟风弄月的‘名士’,或者是……说简单些,读书的高等游民。他什么都懂得一点,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”。^⑫瞿秋白以文人为无用,激烈批评着这样的形象,却又自居文人,这种自毁自弃式的批评,和上述的悲苦叙述异曲同工。不过,佛教大悲导向的是起苦而不住涅槃,前提则是智不住三有,即超脱三界才能所缘众生,而瞿秋白的性格却让他很难自居为引路人,他解释赴俄的动机时说:

全宇宙不过只这一“求安而动”的过程,安与不安的感觉,又只在前“五识”及第七识上显现,以为行为最后的动机。第六识(意识)的动机是粗象而且虚伪谬误的。而社会的意识(社会的第六识)尤其常常陷于伪造幻象错觉。动的过程只在直觉直感于“实际”时显其我执(第七末那识)的功能。我旅俄的意义,实是我直感的反射动作。第六识的分别,计较成败所影响于行为的极少。^⑬

根据唯识宗所讲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根(又名末那)、如来藏(又名阿赖耶、真如等)八识,瞿秋白认为自己基本还是在第六识(意识)的层面,是直感的反射动作,所以他会本能地自我否定:“我冒险而旅俄,并非是什么‘意志坚强’,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——为社会——而行;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,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。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,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。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,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。”^⑤然而,时代毕竟给了他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”的承担,巨大的责任和严格的自我审视之间的落差,让瞿秋白深感无力,他的自我否定或可看作是对这样一种责任所造成的紧张的释放。

瞿秋白的自我否定推向极端就是“死亡”叙述。《饿乡纪程》中,瞿秋白数次谈到“死”:“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,以为自趋绝地,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,论点根本不同,也就不肯屈从。”瞿秋白的意思是,瞿纯白以去俄国有风险反对瞿秋白去俄国,而自己却恰恰是“为死而走”,这一点,他在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解释:“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。‘宁死亦当一行’。一如其还有‘社会’‘文化’观念,求为人而劳动,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。”^⑥

现代作家王统照的回忆中也谈到瞿秋白的为死而走:

我还记得在那年秋末的时候,在西城我们的寓所中,C君去同我与S君谈起这回事,C君说:

“他这一走是决定了!……他为什么走?他居心要往这条路上走!他的心意的罗盘针,与他的境遇的四围雾雾,使他要定了决心走这条路!……他这一走,是抱了满腹人生的苦痛走的,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,找得出一条死路,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……”^⑦

看得出来,这里的为死而走,其实恰在于生,也就是佛教和后来海德格尔都讲过的“向死而生”。死是埋葬旧我,死又是新生,既求得自己的新生,也为社会寻一条生路。这和瞿秋白前述爱情上的自我埋葬,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,埋葬自己的爱,是为了放爱的人可以自由地爱;埋葬无力承担的自我,恰恰是为众人寻一个自我。

驻留哈尔滨时,他和俞颂华聊天,再次说到死:“那时听说莫斯科食粮缺乏,燃料不足,又常常说笑话:‘颂华,我们去了,不但冻饿,还有别种危险,兴兴然而去看‘新奇’,也许不幸奄然而就死。颂华道:‘你为什么说这种不祥的话,扫兴得很!’”^⑧

瞿秋白谈到死,一点也不避讳甚至刻意谈论,对于多少有些出行前的忌讳的俞颂华来说,很容易惹起不快。应该说,瞿秋白成为访问俄国最早的一批中国记者,机缘难得。1920年11月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、北京《晨报》刊出启事,内称:“吾国报纸,向无特派专员在外,探取各国真情者,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。国人对于世界大势,亦每因研究困难,愈趋隔阂淡漠,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。吾两报有鉴于此,用特合筹经费遣派专员,分赴欧美各国,担任调查通讯事宜,冀稍尽吾侪之天职,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。”^⑨两报共向美、英、法、德、俄派出8位新闻特派员,美、法、德各一,英国两位,俄国独占三位。俄国三位,当时公布的名字是瞿秋白、俞澹庐、李续忠,亦即后来更通用的名字:瞿秋白和俞颂华、李仲武。^⑩

探访革命后的新生苏维埃国家,是一个堪称艰巨的任务,当时,报社开出非常高的报酬,瞿秋白自述:“年领晨报馆薪金洋二千元。”^⑪对于一个刚刚20岁出头,生活又相当窘迫的年轻人,这样的薪水不能不说有很大的诱惑力,和当时普遍收入比,更是非常突出。和瞿秋白一起去俄国的俞颂华、李仲武,社会关系都不一般。俞颂华是日本留学生,梁启超进步系控制的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的编辑,父亲俞棣云曾任上海电报局学堂监督和上海电报局总办,在政商两界都有深厚的人脉。李仲武是梁启超第一任妻子李蕙仙的侄子,梁启超的内侄,瞿秋白俄文专修馆同学。彭述之后来和李仲武多有交集,他的回忆中有一段关于李仲武及瞿秋白赴俄成因的记述,颇足参考:李仲武“姑父所主持的一系列报纸中,最有声望的左派报纸之一北京《晨报》的编辑,希望有一位常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。李仲武满怀希望地要去承担这项任务,但他有自知之明,如果他只身前往,深知无能力承接,理由有二,其一是缺乏新闻工作的经验,其二他的写作方式一般是不够令人满意

的。他便想出一个主意,要同能力比他强得多的朋友和同学瞿秋白合作,以便能够实现两人并肩到俄罗斯首都去工作的愿望”。李宗武的这个想法,得到姑父梁启超的支持,“瞿秋白曾经给梁启超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,他不仅俄语能力很强,而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也是颇有修养的”。^④瞿秋白赴俄,毋宁说是天赐机缘。

正因此,俞颂华或许很难理解瞿秋白的死亡讲述,会将之看成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矫情。但是,对于瞿秋白而言,这一切却是很难忍住的讲述。不佳的身体状况,让瞿秋白时时要面对自己心中的终极恐惧,这是他死亡讲述的身体原因。不过,身体状况只是原因之一,精神上的自我否定更是主因。瞿秋白对于伤痛乃至死亡奇特的亲近是一贯的,同一时期,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直抒胸臆:

自杀!自杀!赶快自杀!你真正有自杀的決心,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,不要叫社会杀你,不要叫你杀了社会,不要叫社会自杀。你不能不自杀,你应该自杀,你应该天天自杀,时时刻刻自杀。你要在旧宗教,旧制度,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,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,你这一念“自杀”,只是一线曙光,还待你渐渐的,好好的去发扬他。^⑤

这里的自杀,既有肉体的毁灭,更多则是精神上的自戕,也即埋葬旧我。瞿秋白很清楚自己身上旧时代的残余,他曾这样剖析自己身上的绅士气:

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,而我小的时候,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。绅士的体面“必须”继续维持。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;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,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,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(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)。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,烧过一次饭。

直到那样的时候,为着要穿长衫,在母亲死后,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,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。我的绅士意识——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——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。^⑥

当瞿秋白为自己的绅士气苦恼时,背后隐藏的

是他和自己无法摆脱的内心的阴影的对抗,他想要摆脱这个世界及其附着于他身上的影子,可是这样的影子却如影随形,时时缠绕着他。他没有轻易选择和解,无论精神还是政治上,最终都宁愿选择自我放逐乃至自我埋葬。《赤都心史》中,他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:“然而‘我’,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”;谈到情性和理智的落差:“现实与浪漫相敌,于是‘社会的无助’更研丧‘我’的元气,我竟成‘多余的人’呵!”;最后的结论是:“然而,宁可我溅血以偿‘社会’,毋使‘社会’杀吾‘感觉’。”^⑦既然自身已成多余,那么溅血以死,也就是另一种圆满了。

三、醉感与罪感

王统照回忆好友耿济之时,将他与共同的好友瞿秋白对照,得出结论,瞿秋白“个性极强,天才高亢……善辩,健谈,尤长于分析,评论。烟酒都颇有‘量’,令人一见便知不是一个规行矩步,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。更非平淡循资,对付时日之流”。^⑧瞿秋白的好友中,不止一个人提到瞿秋白善饮,少年好友羊牧之回忆:“他还会喝酒,平常不见他常喝,可是在汉口时,他却和郭沫若一次喝了白兰地三斤呢!”^⑨羊牧之提到的这个细节,出处应该就是瞿秋白本人,他在临终前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:“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?当年的豪兴,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,留得做温暖的记忆罢。愿你勇猛精进!”^⑩叶圣陶回忆与瞿秋白的交集时,也提到喝酒:“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,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。谈锋很健,方面很广,常有精辟的见解。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,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。他的身子不怎么好,瘦瘦的胳膊,细细的腰身,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。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。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,看见桌上‘拍勒托’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,谈得劲就斟一杯白兰地。”^⑪当瞿秋白准备去俄国时,亲戚给他送别,“他们知道我有远行,开瓶白兰地酒痛饮半宵”。^⑫

人类文明史上,酒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话题。古希腊以神话人物狄奥尼索斯为酒神,同时又是艺术之神、悲剧之神。酒神的冲动代表着放纵和忘我,尼采写道,在酒神的召唤中,“人轻歌曼舞,俨然是一更

高共同体的成员,他陶然忘步忘言,飘飘然乘风飞。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。就像此刻野兽开口说话、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,超自然地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: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,他如此欣喜若狂、居高临下地变幻,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”。^⑤尼采呈现的实际是一种醉态,在美酒带来的迷醉中忘我、放浪,这里面有喜剧,更本质的则是无力面对生命意义的悲剧性陶醉。中国酒文化的代表刘伶、嵇康所呈现的景象和尼采所写大致相同,名士风范、狂放不羁,有意思的是,他们接续的老庄的思想传统,实际也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。

如果拿中西文明对酒的共同理解——狂放、悲喜剧、集体无意识——看瞿秋白和酒的关系,或许可以打开认知瞿秋白的一个视角。瞿秋白善饮且善谈,这是酒文化的理想境界,当王统照强调瞿秋白“不是一个规行矩步,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”时,举出的例证即“烟酒都颇有‘量’”,这是关于酒和个人性格关系的习有解读。而瞿秋白性格中自我放逐的悲剧色彩,与他青少年时代以老庄为思想阅读的起点^⑥结合看,或许不仅仅是巧合。酒可以带来冲动和迷醉,但酒的世界终究是超现实的世界,善酒者都不得不习惯于两个世界的转换。瞿秋白曾自我剖析道:“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,时时想超越范围,突进猛击……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,亦坚固得很,‘总应当’脚踏实地,好好的去实练明察,必须看看现实的生活,做一件事是一件……两派潮流的交汇,湍洶相激,成此旋涡——多余的人。”^⑦浪漫派和现实派间的张力,大概在酒的世界中最能充分体现却也最易于调适。

不过,酒的世界终究是虚幻的,回到现实时,瞿秋白还是不得不面对两个世界的冲突:

无谓的浪漫,抽象的现实,陷我于深渊;当寻流动的浪漫,现实的现实。不要存心智相异的“不正见”,我本来不但如今病;六七年来,不过现实的生活了,心灵的病久已深入,现在精神的休养中,似乎觉得:流动者都现实,现实者都流动。疗养院静沉的深夜,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旧怀里;江南环溪的风月,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。唉!现实生活在此。我要“心”!我要感觉!我要哭,要

恸哭,一畅……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。^⑧

病床上的瞿秋白,在回忆中反而触摸到现实的世界,这当然不一定是瞿秋白实在的经历。瞿秋白说的不接触现实的六七年,是他经历诸多人生变故的时期,母亲自杀、到学校教书、去武昌寻亲、上俄文学校、参加五四运动、接触新思潮、以记者身份访俄,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生的大变动,到瞿秋白这里,居然如此波澜不兴,甚至都没有成为现实的资格。瞿秋白笔下的现实却又是“江南环溪的风月,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”,这与其说是常人眼中的现实,不如说是瞿秋白心中的感觉,是他可以用心触摸到的流动的情感,或者说是醉感的现实。所以,当瞿秋白批评自己不在现实中时,他说的或许只是他感知到的那个现实,而他感知到的那个现实对于他者而言,恰恰可能是不现实的。

瞿秋白常常营造着自己的世界,但是,他又绝不是一个遁世者。五四时期,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对参与群众运动及社会运动的理解,更能代表他当时当地对自己的期许:

社会运动的牺牲者……因怀疑而觉悟,研究的结果就能创造新的信仰、人生观;毅力的坚决就能打破旧的习惯、制度。他因此能不受旧社会力的暗示,觉着不得不打破旧的习惯和制度,因而牺牲“旧习惯所生出来”的快乐,牺牲“旧制度所生出来”的利益;觉着不得不创造新的信仰和人生观,因而牺牲精神去研究,牺牲旧社会的虚荣去实行他,甚至于牺牲性命。

改造社会就要有牺牲的决心,牺牲旧社会的虚荣,牺牲自己的性命,正是这样的认知和精神,让瞿秋白后来和革命有了更多的契合。在这里,自我并没有导致对世界的排斥,相反,恰恰由于自身的改造引导到对社会的改造,这是五四一代的共同思想路径。社会改造首先针对的是自身从旧习惯获得的快乐,旧制度获得的利益,乃至旧社会滋生的虚荣,革命是革心,为了这样的革心,自我埋葬,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。所以,瞿秋白说:

“我将成什么?”盼望“我”成一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。新文化的基础,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

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：东方与西方。现时两种文化，代表过去时代的，都有危害的病症，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，一病“东方式”的死寂。

“我”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，而是“新时代”的活泼稚儿。^⑤

这个新时代的活泼稚儿需要创造，但瞿秋白更多想到的常常是牺牲和不牺牲：

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，或者他的绝对不能牺牲的东西——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狂热的感情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积极的怀疑心，他们绝对不牺牲他们的人格——才能去牺牲。假使没有一件不能牺牲的，又何必要求“解放”和“改造”呢？只看他所不肯牺牲，不能牺牲的是什么，是否可以拿来供改革社会——创造新的信仰，人生观，改革旧的制度，习惯——之用，是否对于改革社会有较大较好的效用，还是狂热的感情呢，还是积极的怀疑心呢？就可以知道他的牺牲对于改革社会有何等样的价值。^⑥

不能牺牲的——感情、怀疑心、人格，这里面可以看出瞿秋白珍视的都是什么。固然在之后的岁月里，特别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，瞿秋白的思想世界会发生很多变化，但这些被珍视的一直跟随着瞿秋白。正是这些，造就了瞿秋白身上的多重气质，使得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不是那种充满道义上的优越感、行侠仗义的侠客，而是常常体现“弱者的道德”的旁观者：

我有许多标本的“弱者的道德”——忍耐，躲避，讲和气，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。固然从少年时候起，我就憎恶贪污、卑鄙……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。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，有可能呢，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；没有可能呢，让他们去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？^⑦

这样的不彻底，这种对醉感的现实的留恋，常常让瞿秋白觉得自己“多余”，甚至产生“绅士”“文人”的罪感。如果瞿秋白生活在传统时代，或者哪怕在新文化运动后，没有进入中共的革命阵营，他的这些气质应该不会构成如此之大的困惑乃至紧张。然而，个人和时代的因缘际会，让瞿秋白走到了聚光灯

下，他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站在最前面的领袖，甚至成为激进的“左”倾错误的代表。在这样狂飙突进的过程中，他需要粗粝自己以和社会接轨，可是内心又总有一股力量拉扯着他，在革命者和旁观者、粗粝的大众和精致的绅士、融入的现实和珍爱的生活之间，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，但让他苦恼的是，站在队里的他，内心中总有一股异己的力量，在心底冲撞、徘徊。更吊诡的是，当他下决心站到现实一边时，有时又会发现，弄清现实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。瞿秋白曾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“现实”：

“现实”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终胜利的道路。无产阶级需要认识现实，为着要去改变现实。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，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，而在行动斗争之中去团结自己，武装自己；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勇的情绪，去为着光明而斗争。^⑧

这里面的现实，承担着为无产阶级开辟胜利道路的重任，而认识现实的目的，又在于改造现实。革命语境下的现实，常常变动不居，把握艰难，1927年后瞿秋白被认为的“左”右摇摆，与此就不无关联。1931年写下上面这段话时，他已离开中共高层，心绪灰暗，这段话里的高调或许正是折射他现实中的迷茫。他在几年后承认：

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——高等游民，颓废的，脆弱的，浪漫的，甚至狂妄的人物。说得实在些，是废物。我想，这两种意识在我心里不断地斗争，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。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，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、新的感觉方法。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。^⑨

瞿秋白有极强的个性，这样的个性让他能够切身感知到个人和环境的冲突，对个人面对环境巨大的笼罩力量时有可能的遭遇，他早就有详尽的分析：“个性问题有渊深的内性：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，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、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，屈伸自如，从容自在；或者呢，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，狂暴忿怒面红耳赤的与障碍相斗，以致于失全力于

防御斗争中,至于进取的创造力,则反等于零;或者呢,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,整个儿的为“社会”所吞没,绝无表示个性的才能。——这是三种范畴。”^②然而,这个分析似乎不能把他本人囊括其中,他肯定不是完全的吞没者,却也不是从容自如的应对者,之所以不能从容自如,并不完全缘于能力不够,更多的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及深刻的自我怀疑,而这样的态度和怀疑又和社会巨变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。葛兰西说:“当环境狂热到极度紧张,当巨大的集体力量被煽动,压迫个人直至消逝,以便获得创造意志冲动的最大效率,那么,在一定历史时刻和一定环境中,形势就变成悲剧性的。对于具有非常敏感和追求完美的气质的人来说,形势成为灾难性的。而对于社会落后成员,例如农民,则是必要的,不可或缺的,他们的强健神经可以大范围伸展而不受伤害。”^③瞿秋白正是葛兰西说的这样的人,也遇到了葛兰西说的这样的时代。

瞿秋白精神世界里对自我的弃绝,在《多余的话》中推到了顶点:

我的脱离队伍,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,结束这一出滑稽剧,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,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,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。

永别了,亲爱的朋友们!七八年来,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。这种疲乏的感觉,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,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,无可忍受的地步。我当时觉着,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,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,我只要休息,休息,休息!!好了,现在已经有了“永久休息”的机会。^④

《多余的话》真正要表达的,其实是“多余的我”,而这样的讲述,当瞿秋白刚刚能够公开言说时,就已经开始了,《赤都心史》中的“多余人”,未尝就没有他自己的影子。产生于不同时代、不同背景下的作品,基调的高度一致,可以说明用自我贬抑的方式叙述自己,是瞿秋白习惯的做法,《多余的话》中的自我贬抑只是这种习惯的延续,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有意为之。最初的讲述是在对抗,就如讲述死亡是在对抗死亡一样,他讲述“多余”正是为了摆脱“多余”。

然而,肩上那些不知名的背负,让他的解脱本身也变得多余。《多余的话》终段,他以这样的序列最后向这个世界告别:

俄国高尔基的《四十年》、《克里摩·萨摩京的生活》,屠格涅夫的《鲁定》,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里宁娜》,中国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,茅盾的《动摇》,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都很可以再读一读。

这是他喜欢的书。

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,世界第一。

这是他喜欢的食。

永别了!^⑤

四、结语

清末民初,中国再造,历史在这里断裂。在新旧转换之间的知识人,既是断裂的推手,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新旧之间的桥梁。他们肩着黑暗的闸门,想要放进光明,又时时担心着自己的身影也成为黑暗的帮手。瞿秋白担着寻找光明的责任,却有着不能踏进现实的担忧,旧时代的“文人气”“绅士气”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瞿秋白曾经和鲁迅成为相知,都有着共同的难以摆脱的关于黑暗的记忆,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,内心中的自我挣扎或许还超过鲁迅。鲁迅是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的大绝望,而瞿秋白是看到希望的光芒,却摆脱不了内心黑暗的痛苦。镜子里的影子,勾勒出的是无尽的虚无。瞿秋白总是批判自己和现实相隔太远,然而他的这种批判正是建基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之上,他曾经谈道:“不是有了集权主义‘四个中国字’才有集权制度的!‘抽象名词爱’的青年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,那时才知道实际生活,社会生活中每每是‘非集权非分权’,‘非彻底非妥协’,‘亦总解决,亦零解决’……现实是活的,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,不是先立一理想的‘主义’,像中国写方块字似的一笔一笔描在白纸上去的。”^⑥瞿秋白很清楚应该有什么样的现实,他也为之努力奋斗,却似乎和现实总有一段距离,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责任,有时却并不一定就应由他负责。近代中国,寻找现实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,很长时间里,“现实”并不总在现实之中。

瞿秋白以一个“文人”的身份,在激烈变动的社

会政治大潮下,一度引领时代,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心人物,这和五四新文化树立起的思想革命这个社会主题不能说没有关系。像瞿秋白这样并不属于他所说的“政治动物”的知识人,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,他自己说是“历史的误会”,其实更可能是时代的误会,中国历史上,这样的时代即便不是绝无仅有,也十分罕见。实际上,随着现实政治的狂飙突进,权势转移很快会发生,瞿秋白的退出政治前台,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,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
瞿秋白的话题总是不无沉重,瞿秋白、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的痛苦,是一个时代活得认真的知识人的痛苦。瞿秋白肩负着追求光明的重任,却常常在想象和实在的现实间陷于迷茫,这样的困惑绝非他所独有。他用个人的自省、自责乃至自罪试图从迷茫中卸脱,不管是否成功,却可以看到后来中共思想改造路径逐渐生成的最初影子,而他的个人际遇,也让他成为中共革命中不惮于通过自省毁灭旧我的独特的“这一个”。瞿秋白离开政治高层之后,一度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努力,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寄托着他对大众更多的期望,这一临去前的回响,如果联系他在现实面前常常有的把握不定的困惑,似乎又在以特殊的方式,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。

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,得到诸多师友帮助,李志毓、刘文楠贡献尤大,特此致谢!

注释:

①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6年,第13页。

②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11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年,第101页。本文所引两人通信中的省略号均属原文。

③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5页。

④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3年,第700—701页。应该如何认

知瞿秋白《多余的话》,从1979年陈铁健先生发表《重评〈多余的话〉》以来,即为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。如果把认知时间拉长,不局限于《多余的话》本身,或可对此可有更全面的理解。《多余的话》呈现的自我怀疑、自我否定等悲观情绪,事实上在他早期的作品《饿乡纪程》《赤都心史》中已有很明显的体现,后来也不时出现。丁玲透露,1924年,瞿秋白给她写的信中,透露了类似《多余的话》中的情绪:“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,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,也婉转得多。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,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,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,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、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,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,尽管是迂回婉转,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,但还不像后来的《多余的话》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,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、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。”(丁玲: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,《丁玲全集》第6卷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54页)从《饿乡纪程》开始,到丁玲所说的那些信,再到《多余的话》,有一个瞿秋白思想和性格连续展现的过程。《多余的话》并不是横空出世,而是一以贯之的性格积累在特殊状况下的总爆发。当然,正因为瞿秋白一直以来的自我贬抑态度,他的自述,无论早期还是后期,又都不可全信,可信其气质,不可全信其讲述。

⑤丁玲: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,《丁玲全集》第6卷,第39页。

⑥蒋祖林:《丁玲传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年,第57页。

⑦《丁母回忆录》,《丁玲全集》第1卷,第325—326页。

⑧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7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90—91页。

⑨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8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93页。

⑩王剑虹致瞿秋白(1924年1月7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45页。

⑪王剑虹致瞿秋白(1924年1月19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50页。

⑫王剑虹致瞿秋白(1924年1月20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52—153页。

⑬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26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31页。

⑭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26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34页。

⑮瞿秋白致王剑虹(1924年1月17日),瞿独伊、李晓云编注:《秋之白华——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》,第115—116页。

⑯瞿秋白:《社会运动的牺牲者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1卷,第53页。

⑰蒋祖林:《丁玲传》,第58页。

⑱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1—712页。

⑲瞿秋白:《致郭沫若》(1935年5月28日)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2卷,第418页。

⑳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2页;或有人质疑,瞿秋白并不是不争论,中共五大和彭述之的争论,可以说就是瞿秋白主动发起的,对此,瞿秋白自己也有解释:“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,有时候仿佛很激烈,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。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‘也对’,‘也有几分理由’,‘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’。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。所以我毕竟做了‘调和派’的领袖。假使我激烈的辩论,那么,不是认为‘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’,因此勉强着自己,就是没有抛开‘体面’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,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,使我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’。”尽管可以怀疑瞿秋白的这些讲述有刻意贬抑自己的成分,但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的发难如他自己所说,更多是履行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职责,并不一定会影响关于他性格的讨论。

㉑为自己并不一定适应的时代欢呼,本身也是瞿秋白的精神特征,他明白时代的趋向,竭力向时代靠拢,甚至自己也在撑起时代,却又始终难以摆脱和时代的隔膜。事实上,这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困惑,如鲁迅所谓肩起黑暗的闸门。

㉒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3页。

㉓郑振铎:《记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》,史习坤编:《瞿秋白研究资料》上,北京: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,1982年,第315—316页。

㉔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694—695页。

㉕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》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2年,第62页。

㉖瞿秋白:《心的声音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2卷,第5—6页。

㉗张历君的《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》(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20年)详细讨论了该文与詹姆士·柏格森的关系,

颇具洞见。详见该书第94—97页。

㉘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5页。

㉙欧阳渐:《唯识抉择谈》,《欧阳渐大德文汇》,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12年,第73页。

㉚1915年,年轻的吴宓谈及他接触佛理的经过,颇可见出佛教于这一时代振拔人心的效果:“昨春以境事触逆,心情颓丧,阅《传灯录》至五祖教六祖出家一段,谓众生苦恼,均缘心意惑蔽而起。世善恶果报,虽似极端舛错,然为善行德,终有永久宏大之报酬。悟而心以安,如病之得药也。今读《无量寿经》,则佛氏大同救世之义,陈说更为精警。其导人行善绝恶,曲己为人,益不容有一毫疑惧迟回态度。余感于事变,方深愤郁之情,读此如冷水浇背。此后誓愿本佛理以行事,虽胥弗恤。诚能牺牲一己,以利群众,则忽然直前,无复顾虑。”(《吴宓日记》第1册,1915年1月24日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8年,第392页)

㉛吴虞日记载,梁漱溟即告诉他:“佛经最好是《成唯识论》,但止看《成唯识论》不够,必看辅助之书。如,《成唯识论述记》、《唯识别钞》、《唯识料简》、《唯识了义灯》。”(《吴虞日记》上册,1921年11月11日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653页)

㉜1920年,王若飞在自画像中说:“社会是罪恶,人生是悲苦,这两句话他很相信。但他不因此而入厌世一流。以为我们当战胜罪恶,战胜悲苦,创造一个理想世界。”(王若飞:《一个特别的学生》,《王若飞文集》,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6年,第10页)这里的他,就是王若飞自己。从王若飞的表述中,可以看出悲苦叙述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,个体的选择只是接受或不接受。

㉝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0页。

㉞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58页。

㉟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页。

㊱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17、58—59页。

㊲王统照:《新俄国游记》,《王统照文集》第6卷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82年,第385页。

㊳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59页。

㊴《上海时事新报、北京晨报共同启事》,北京《晨报》1920

年11月27日,第2版。

④李仲武(1899—1938),贵州省贵筑县(今贵阳市)人,原名李续忠,又名李宗武,出身于贵州世宦之家,祖父李朝仪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、同治年间任顺天府尹。伯父李端棻是光绪年间进士、官至礼部尚书。因父母早亡,由姑姑李蕙仙和姑父梁启超抚养长大。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,与瞿秋白同学。1920年10月受聘为北京《晨报》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特派记者前往苏俄,1921年9月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翻译。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4年夏回国,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苏联顾问团翻译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,1931年任国立北平大学教授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随苏联航空专家在兰州空军总站任高级翻译,1938年3月因飞机失事遇难。

⑤《李克长访问记》,《国闻周报》第12卷第26期,1935年7月6日。年薪2 000元,当时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,吴虞192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,月薪为260元。他在学校吃包伙食,每月仅需7元。《吴虞日记》上册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643页)

⑥彭述之:《彭述之回忆录》上册,香港:天地图书有限公司,2016年,第267—268页。

⑦瞿秋白:《自杀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2卷,第3页。

⑧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699—700页。

⑨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19—220页。

⑩王统照:《追怀济之》(1947),《王统照文集》第6卷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115页。

⑪羊牧之:《我所知道的瞿秋白》,中共上海市党史研究室编:《上海党史资料汇编》第5编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8年,第34页。

⑫瞿秋白:《致郭沫若》(1935年5月28日)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2卷,第418页。

⑬叶圣陶:《回忆瞿秋白先生》,《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叶圣陶卷》,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1996年,第222页。

⑭瞿秋白:《饿乡纪程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19页。

⑮弗里德里希·威廉·尼采:《悲剧的诞生》,周国平译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年,第92页。

⑯瞿秋白自己说:“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,随后是宋儒语录,随后是佛经、《大乘起信论》——直到胡适之的《哲学史大纲》、梁漱溟的《印度哲学》,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、文艺评论。”(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02页)郑振铎说瞿秋白:“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好,并大量的刻苦的读着哲学书。对于‘老’‘庄’特殊有研究。”(郑振铎:《记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》,史习坤编:《瞿秋白研究资料》上,第314页)

⑰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19页。

⑱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20页。

⑲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13页。

⑳瞿秋白:《社会运动的牺牲者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1卷,第53页。

㉑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2—713页。

㉒瞿秋白:《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479—480页。

㉓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00页。

㉔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12页。

㉕葛兰西:《狱中书简》,田时纲译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405页。

㉖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17—718页。

㉗瞿秋白:《多余的话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7卷,第720页。关于《多余的话》最后几段话的含义,论者多有解读。单世联说:“瞿秋白在无意识中以豆腐来象征自我,豆腐的纯净值得赞美,豆腐的软弱不妨碍它是世界第一。”(单世联:《枉抛心力作英雄——重温瞿秋白〈多余的话〉》,《同舟共进》2000年第6期)本文认为,或许瞿秋白这几段话并没有那么多隐喻,他只是在以好书、美食这样的顺序,向这个世界最难舍弃的东西告别。

㉘瞿秋白:《赤都心史》,《瞿秋白文集》(文学编)第1卷,第247页。